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若干思考

陈 华 娟 王 开 莉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325035;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从量变质变规律来看,虽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换,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质”的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转换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量”变的基础上,是“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它与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不矛盾。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要求我们做到以下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满足人民的“硬性基本需求”与“软性其他要求”的有效结合;三是将深化改革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结合起来,以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关键词:新时代;主要矛盾;现代化;阶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2-0033-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200

任何社会形态,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变化,总是会呈现出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我国发展方位的变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作了新的界定。那么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学说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与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否矛盾?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基本要求?思考上述问题,对于澄清一些模糊的思想认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解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学说概述

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矛盾的推动。关于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人类社会,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由此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关于主要矛盾,马克思在1857—1858年期间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曾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

收稿日期:2018-11-16

作者简介:陈华娟(1986—),女,安徽淮南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通讯作者)王开莉(1975—),女,重庆人,法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和谐互动研究”(17BKS167)。

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24}这种处于支配地位、具有决定影响的生产及其关系,就是一定社会形式的主要矛盾。列宁则进一步把抓住主要矛盾这一原理运用到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来。1918年,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2]506}之后,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3]692}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统创立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是毛泽东。其代表作是他于1937年8月所写的《矛盾论》。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主要有:一是对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论述,他明确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4]322}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条件下,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在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4]322}二是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抓住主要矛盾的重要性,他强调:“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322}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主要任务;四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事物的发展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长过程中,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变化,总是会呈现出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若干不同的主要矛盾。而且,处于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不同国家,它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矛盾,也会因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往往有所不同。即使就某个国家的某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来说,也往往会出现一些主要矛盾不同的若干阶段。比如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主要矛盾发生了四次变化。第一个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反动军阀的矛盾;第二个阶段是土地革命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矛盾;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后,在解放战争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四个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主要矛盾是存在于社会历史的一定时期、一定的阶段,它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而变化的。

就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关系来看,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基本矛盾是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主要矛盾则不是,它会随着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二是一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214}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非对抗性,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后者的矛盾具有对抗性质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会有不同,但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一般是不会改变的。三是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主要矛盾是一个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力,这些主要动力的趋向与基本动力的趋向是一致的,而且终归是为了促使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

二、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嬗变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即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但是,随着反右派扩大化和“左”倾主义思想的滋长,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也出现了误判。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至于进一步促进了“左”倾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也是后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发生“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12]}这一表述一直延续到十九大前。

2017年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特点,作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论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注意到,对于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这一新表述,有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没有变,那么主要矛盾怎么就发生了转换?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没有变化的背景下,改变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否合适?

实际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九大之前就有不少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转变的问题。如早在2005年杨鹏就指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7]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当生存性矛盾总体上已经解决、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突出问题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矛盾。”^[8]还有的学者认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已是需求不足与扩大需求。”^[9]那么如何看待近年来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上述观点?回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必须阐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起,需要上百年的历史时期。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其本身也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同而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由于人民的需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会有所不同,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也会有所不同,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人民需求的新变化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依据。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从国家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接近20%,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10]目前,我们正处于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二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只有220多美元,到2016年达到8020多美元。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脱贫攻坚战取得显著成就,仅2012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1391万人”^[11];三是从人民需求来说,人们需求更趋多样化、多层次化,除了硬性基本物质文化需求之外,软性其他要求也不断增强,如人们对社会公平、美好生活环境的要求更加强烈。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也日益广泛。但另一方面,表征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0.465的高位(2016)^[12],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更加突出,这就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随着我国发展呈现出的阶段特征而发生新的转化。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如上所叙,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基于我国发展呈现的新特征,也尝试着概括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如将“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或者是“需求不足与扩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我国仍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还需要克服一个个的难关,迎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这就决定,当下中国社会的中轴仍然是发展。保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在经济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保障。虽然,当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追求稳定的收入、舒适的居住条件、高质量的生活等“硬性基本需求”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可以说,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国情没有改变,我们就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忽视我国的具体国情,尤其是忽视人民的物质文化的生活“硬性基本需求”,绕开“发展”这一主题,把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单纯地概括为“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或者是“需求不足与扩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不科学的。从这方面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概括既与当前人民需求的新变化相符合,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一致。

第三,相比较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从事物量变质变关系来看,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依赖于量变。同时,量变和质变是互相渗透的,这种相互渗透就在于,在总的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中有量的扩张。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表现之一就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它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一些次要性质发生了变化,因而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看,只要初级阶段的这一国情没有改变,主要矛盾就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这也是笔者在前文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能避开人民硬性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绕开“发展”这一“主题”的重要原因。但是,没有发生“质”变,不代表就没有发生量变。实际上,随着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我国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来看,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已得到满足,人民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基于此,党的十九大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适时地转化。这种“转化”是建立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新的变化基础之上的,是对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要矛盾的“升级转化”。但我们又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也同样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决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区间内的矛盾。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质”的改变,而是“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

总的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需求的新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呈现的一系列新的特征基础之上。这一判断是基于中国国情所做出的科学判断。从量变质变规律来看,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质”的变化,它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量”变的基础上,是“总的量变中的部分质变”。

三、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基本要求

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新判断,对于我们把握人民需求的新变化,对于明确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在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认为必须做到以下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将满足人民的“硬性基本需求”与“软性其他要求”结合起来;三是将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主要

矛盾的解决结合起来。三者之间密切是联系的整体,其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价值导向,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满足人民的“硬性基本需求”与“软性其他要求”是两大支撑,没有这两大支撑,就谈不上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也是化解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途径。

第一,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党的执政必须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⁷⁰之后,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表述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不仅表现为“人民”一词本身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表述的“主词”,而且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变的重要依据。此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解决的重要判断标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表述也就内在的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尤其要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以及自己日常工作中都应牢固确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满足人民的“硬性基本需求”与“软性其他要求”的有效结合。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稳定的收入、住房等“硬性基本需求”依然是人们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因此,发展仍是新时代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首要课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代人民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与此相适应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更要推动发展向更高的效益、更高的质量、更平衡更充分转变。具体来说,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指南,并将之贯穿于新时代发展的全过程,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同时注重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提供条件。

第三,将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结合起来,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改革与社会主要矛盾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15]。社会主要矛盾是改革的重要依据;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既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当前来说,尤其做到:一是牵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优化经济结构,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创新发展,进一步壮大、发展实体经济;二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市场主体交易的成本,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税收制度,使税收切实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四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加快教育和医疗领域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五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通过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导向,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举措,促进绿色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上册)[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
- [7] 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N].中国青年报,2005-11-16.
- [8] 张纪,来丽梅.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J].理论探讨,2004(6).
- [9] 刘嗣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新形态——相对需求不足与扩大相对需求[J].江汉论坛,2004(6).
- [10] 曾建平,杨学龙.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在依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 [11] 刘少华.5年来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中国脱贫攻坚获历史性突破[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0-11.
- [12] 2016年全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N].农民日报,2017-1-22.
- [1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7-2.
- [15] 朱进进.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2).

Reflections o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hen Huajuan Wang Kaili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325035;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nineteen congress of CCP according to the new era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new feature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main contradiction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people's growing need to better life with unbalanced and les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hange, the new judge of the nineteen congress of CCP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in contradiction does not mean "quality" change of main contradiction in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t is the change in quantity, which is "the part the total quantity of qualitative change". The judgment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not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that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for a long time. This judg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to clarify the focus of the party and state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new era; major contradiction; modernization; stage

[责任编辑:左福生]